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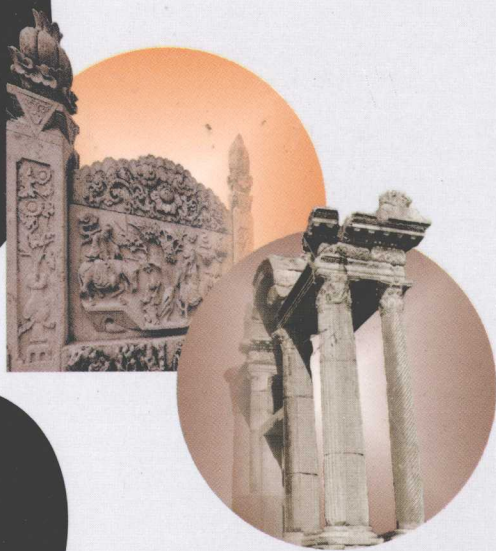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ZHONGWAI WENLUNSHI

中外文论史

第二卷

曹顺庆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013047859

I109

96

V2

比车

四川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

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项目

中外文论史

第二卷

曹顺庆 主编



I109
96

V2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北航

C1655338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曹顺庆

编 委：冯宪光 王晓路 李 怡

徐新建 刘亚丁 阎 嘉

吴兴明 段志洪

秘 书：王彤伟

导 论

本卷是《中外文论史》第二卷，包含第三编（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文论）和第四编（公元3至6世纪文论），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6世纪约九百年的时间。具体而言，在中国，自战国结束、秦统一中国（前211年）始，经两汉（公元前206—公元220）、魏晋（220—420）到南北朝（420—589）止；在欧洲，大约自罗马共和国征服马其顿王国的“马其顿战争”（前214）开始，经奥古斯都（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确立帝制，再经东西罗马分裂（395）至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后约一百年（576）止；在印度，自旃陀罗笈多（月护王）之孙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前273—前232）于公元前261年征服南印度的羯陵伽，统一印度全境，定佛教为国教始，经迦贝贰色迦（约120—162）建立的贵霜帝国（公元1—3世纪）及笈多王朝（公元320年至公元5世纪）的建立，至吠哒人的入侵与笈多王朝的没落和灭亡（公元6世纪）止。

这三大文明圈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既有着不同的历史文

化发展历程，亦有着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神学的兴盛与政治文化专制或曰文化大一统的形成；而这种神学的兴盛与文化专制的形成，恰恰与中、印、欧三大帝国强大的国力、辽阔的版图密切相关，大帝国需要大一统的文化，人间的王权需要天国神权的支撑。于是乎，现实的需要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全球性的造神运动。对人类命运影响极为深远的基督教、佛教与儒教，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推崇、被尊奉、被钦定为“国教”的。中国汉武帝（前156—前87）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前273—前232）定佛教为国教之举可谓遥相呼应；而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约280—337）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以及在小亚细亚召开尊崇基督教的尼西亚会议，亦与中国汉宣帝召开“石渠阁议”（前54）诏诸儒讲五经以及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会议”（79）“帝亲称制临决”异曲同工。这几位帝王的举措，无非都是为了强化统治而借助神权大搞文化一统，或曰文化专制。这种由各大帝国最高领袖亲自倡导的旨在促进文化大一统的全球化造神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主调，成为蔚为大观的神学文化主潮。在西方，它直接导致了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一统天下，强大的宗教神学势力，逼使西方文化严重扭曲，基督教神学将一切科学文化都加以曲解，致使西方中世纪文化成为了所谓神学的“婢女”。在强大宗教神学的压抑和扭曲中，西方文化日渐没落，逐渐步入神学迷信猖獗的中世纪文化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中国两汉也由于“独尊儒术”而大搞“天人感应”的神学谶纬迷信，在神学化儒术的强大文化势力控制下，中国

文化也同样被严重扭曲，一切都必须以儒教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致使一切皆成为儒学的附庸。两汉对屈原的论争，对汉赋的讨论以及“多牵强附会之说”的文论经典《毛诗序》权威阐释地位的确立等，皆体现了由文化大一统而造成的文化扭曲现象。可以说，两汉奠定了中国数千年以儒教为正宗“国家宗教”（黑格尔语）的地位，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定了根本的路径。不过，在这一时期里，中国文化却并没有与西方文化一样，对神学化的儒术日渐就范，恰恰相反，魏晋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叛思潮，异端思潮丛杂而生，人们公开宣称儒家经典为“臭腐”、“芜秽”。（如嵇康曰：“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时期，其突出表现就在于对核心文化（神学化的儒术）的批判与解构，对异族文化（印度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接受和改造以及异端反叛思潮的涌起。正是由于文化的转型，使中国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辨异常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的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高峰正产生于这一时期。这种文化上的繁荣与西方中世纪神学长期一家独霸的文化衰落趋势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化的黑暗，直接导致了西方文学理论的衰落，自圣·奥古斯丁（350—430）之后，至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里，除个别僧侣的只言片语以外，西方文论基本上是一片荒芜的景象。正如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是从完全原始状态发展出来的，它毁灭了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而在一切方面都从头开始。中世纪从已经灭亡的古代世界得到的唯一东西，就是基督教。”（恩格斯《德国

农民战争》，中译本，第 25 页）

此时期的印度与古罗马、中国两汉文化与文论极为相似。周一良等主编的《世界通史》在“孔雀王朝的建立及其专制统治”一节中指出：“至孔雀王朝时，君主专制比以前更为加强。……阿育王征服羯陵伽后，信奉佛教，在帝国境内很多地方或开凿岩壁，或树立石柱，上面刻有诏令，宣称征服不应假手于战争，而应当依靠佛法。……约在公元前 253 年，阿育王召集佛教僧侣，在华氏城举行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编纂整理经、律、论三藏经典，解决各派之间的争论。”阿育王“所信奉和竭力宣扬的佛教教义，则是用以麻痹人民，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 281 页，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然而，由于佛教与印度文化的独特性，使得此时期印度虽然走向神学（主要是佛教）一统之路，却又呈现出与罗马基督教文化专制与中国儒学独尊的文化专制所不同的文化宽容色彩。早期佛教着重于伦理教诲，不拜偶像，主张众生自然，佛只指出途径。公元 1 世纪时，佛教受婆罗门教影响，开始主张佛有许多化身，造出各种菩萨，同时崇拜偶像，新兴教派自称“大乘”，主张不但自救，还能普度众生。佛教的兴盛，使印度文化宗教色彩更加浓郁，然而在宗教与文学艺术融合之中，印度文学与文论非但没有走向衰落，而且还借助佛教的广泛宣扬与传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欧洲宗教兴盛导致文学艺术衰颓恰恰相反，印度佛教兴盛的同时，也正是印度梵语古典文学最为兴盛之时，对世界古代文学产生广泛影响的著名的《五卷书》就在笈多王朝时编写成集，文论巨著《舞论》

也在公元前后成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理论家马鸣（约公元1—2世纪），竟然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戏剧作家。他不但著有《佛所行赞》、《大庄严经论》等佛教著作，同时著有叙事长诗《美难陀》和戏剧《舍利佛所行》等作品。从马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佛教与文学艺术相辅相成、共同繁荣之现象。

在上半期，即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的五百年时间，约相当于中国两汉、罗马共和国晚期与罗马帝国前期以及印度孔雀王朝与贵霜帝国时期，中国与罗马两大文明圈的文学理论著作数量与水平大致相当。在中国，有《乐记》、《毛诗序》、《楚辞章句序》、《淮南子》以及司马迁、班固、扬雄、王充等人的文论；在罗马，有贺拉斯《诗艺》、朗吉弩斯《论崇高》及西塞罗等人的文论。总体而言，东西方两大帝国的文学理论成就皆是不高的。可以说，两汉与罗马这两大帝国在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上皆大大落后于与此相邻的时代：维吉尔根本无法与荷马争雄，奥维德也不能与古希腊诗人比肩；司马相如既乏屈原之雄才，扬雄亦无曹植之灵秀。贺拉斯、朗吉弩斯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天壤之别，《毛诗序》、《乐记》、王充等在文论上也无法与《文赋》、《诗品》、刘勰等相比。但是，尽管这一时期的文论成就不高，其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继古希腊及先秦文论奠基之后的一个文论经典或曰文论范型确立的时代。《毛诗序》、《诗艺》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短短一篇《毛诗序》（大序），竟成为“千余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而理论价值远远不如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贺拉斯的《诗艺》，在对后世文论史的

影响上却堪与亚氏《诗学》相提并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著作确立了文论经典或文化范型。在中国，汉代文论确立了“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和“微言大义”式的曲折言说方式；在欧洲，罗马文论确立了依古典（古希腊）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并确立了古典主义文艺的法规。它们因而对后世文论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与此不同的是，印度此时产生了一部伟大的文论著作——婆罗多牟尼的《舞论》，使得这一时期的世界文论史顿生光彩！《舞论》不但是印度最早、最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而且是全世界文论著作中堪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中国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相媲美的最杰出的文论专著。《舞论》的产生，标志着世界文论的第二个高峰的到来。与中国两汉文论和罗马文论的相似之处在于，《舞论》不但理论价值极高，而且对印度后世文论影响深远；印度以后的文论著作，大体上没有超出其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舞论》同样为印度文论确立了经典范式，确立了印度独具的“情味”论、“庄严”论等等话语方式。

在下半期，即公元3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外文论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中进一步展开的，由于公元6世纪以前除中、印、欧以外的其他国家（文明圈）尚没有较为成形的文学理论著作（或篇章）（阿拉伯文论至6世纪末才出现文学批评的萌芽，日本文论到8世纪才开始形成，而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就更晚了。详参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这一时期的文论只能够论述中、印、欧这三大文明圈的文学理论。而这三大文明圈中，由于文学理论发展的

不平衡状态，决定了本书对中、印、欧文论介绍和论述的不平衡状态。

公元3—6世纪，东西方同时陷入了战乱之中，长期为兵燹战乱所困扰。自汉末黄巾起义开始，中国陷入了一个长期战乱的时期，整个魏晋南北朝（220—589），中华大地内忧外患，几乎从未间断。自黄巾起义（184）至陈朝灭亡（589），长达四百余年的时期内，战乱此起彼伏。

历史常常会有偶然的巧合。西方在相同的时期中，也经历了一个蛮族入侵、割据四起、内忧外患的痛苦的战乱时代。自公元3世纪起，古罗马帝国内战不断，农村枯竭，城市衰落，产生了严重的危机。这种蛮族入侵，史称“民族大迁徙”，从公元3世纪起，一直延续到公元6世纪后期才结束。西方的这近四百年间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内忧外患而产生“五胡十六国”相似，蛮族的入侵，不仅推翻了原有政权，而且建立了一系列的蛮族国家。“奴隶和隶农的革命与蛮族的征服相结合，不但颠覆了西罗马帝国，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的蛮族国家。”^①古罗马帝国的内忧外患，与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内忧外患何其相似，都是一个动荡、痛苦的战乱时代。

同时期的印度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印度虽然没有如此惨烈的腥风血雨、刀光剑影，没有如此严重的痛苦和战乱，但也并非没有内忧，没有外患。自公元230年贵霜帝国衰落至公元606年戒日王即位，在长达近四百年的时间中，印度虽曾有过笈

① 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多王朝的统一与强盛，但总的说来，仍是一个征战频仍，内忧外患四起的战乱时代。虽然同样是内忧外患不断的战乱时代，但中、印、欧的文学艺术及文论却并非皆因战乱痛苦而呈现相似的面貌，而是恰恰相反：战乱的时代给西方文化造成大破坏，使欧洲文学从此跌入谷底，并进一步发展为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冬眠蛰伏之状。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取得罗马帝国国教地位，一家独尊，开始了科学思想文化专制的历程。“蛮族”入侵，以战火摧毁了古罗马文明，却继承了它的神权专制并使其进一步强化，欧洲进入中世纪文化“黑暗时代”。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欧洲文学艺术遭到神学的压抑，一片衰落凋零的景象，文艺理论也必然陷于沉寂的命运。这时期，唯有两位神学大师普洛丁和奥古斯丁神学化的文论通行于世，其全部理论使命就在于证实：美来源于上帝，美的标准在于上帝，艺术应做上帝忠实的奴婢；世俗的文艺使人情感激荡，陷入情欲而远离上帝，故而应予排斥。普洛丁和奥古斯丁都是罗马帝国时的人，但他们的文艺思想为中世纪文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中世纪千年文论都是普、奥理论的继承与延伸。基督教日益兴盛，文学艺术则日愈衰落。

这一时期的印度情形既与欧洲相似，又有若干不同。相似之处是此期间佛教大盛，公元3至6世纪是大乘佛教的鼎盛期，并向国外广泛传播。不过，与欧洲宗教兴盛导致文学衰颓恰恰相反，印度佛教兴盛的同时，也恰是印度梵语古典文学最为兴盛之时。尽管此期间印度的文学艺术繁荣兴旺，但此时的印度文学理论却并无什么成就，呈现一种文学兴盛而文论沉寂的现

象：自公元2世纪《舞论》之后，到公元7世纪婆摩诃《诗庄严论》和檀丁《诗镜》等一系列文论著作问世之前，在这漫长的数百年间，印度基本上没有重要的文论著作问世。

与西方文艺及文论沉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文艺和文论的勃兴。农民起义、军阀混战、民族征伐的战乱导致汉王朝“大一统”陷于崩溃，思想文化专制相对趋于松弛，建立其上、定于独尊的儒学（经学）则受到几乎毁灭性批判与解构，社会价值观念嬗变，异端思想蜂起活跃，异族文化被接受并改造、融合，从而实现了文化转型，即由伦理型文化向审美型文化转变。人性从儒学礼教中解放出来，审美感受也从儒家政教伦理文化的压抑下解脱出来，表现出对自然美、艺术美以及人自身的美（形体、气质、才性、风度等）的强烈追求。审美意识的觉醒，其实质是“文的自觉”。首先表现于文学艺术的全面兴盛：五言诗取代四言诗，达到“云兴霞蔚”的高峰，七言诗也在此时兴起，而近体格律诗的产生，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的壮举；小说正式诞生并形成中国小说史的第一个高峰；绘画、书法艺术获得辉煌丰收，名家名作开传世风韵；其他文学艺术门类，如骈赋散文、园林、乐舞、雕刻等，也都各有成就，承前启后。与文学艺术创作兴盛相比翼，文艺理论空前发展，形成高度繁荣的气派，以至许多学者命之为“绝后”的高峰。其主要标志不仅是大量论著的涌现（传世名作《文心雕龙》和《诗品》即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更在于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的确立，如提升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文采）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对艺术想象论（神思）首次给予了系

统论述，文学史观念的建立和运用等等，另外在艺术批评方法、艺术风格、创作论、声律说、文体之辨、文笔之分等问题以及文笔、气、气韵、风骨、滋味等文论范畴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此时的印度，则又是另一种景象。这个时期，印度奴隶制社会最后一个强大王朝——笈多王朝在刀光剑影的征战中崛起，但很快又在外敌入侵和内部矛盾的双重打击下由盛而衰并最终瓦解。与此同时，大乘佛教也发展至鼎盛，并向印度境外广泛传播。但战乱与宗教的兴盛并未像欧洲那样导致文学衰颓，印度古典梵语文学恰恰在这时达到高峰，“名家如林、灿若繁星，作品光彩映照千古”（季羨林《简明东方文学史》）。对世界古代文学产生广泛影响的《五卷书》在此时编写成集，首陀罗迦创作的梵语名剧《小泥车》诞生于此时，而印度最杰出的剧作家和诗人迦梨陀娑也出现于这个时代，他的长篇抒情诗《云使》堪称不朽之作，而他的名剧《沙恭达罗》则立于世界文学史伟大名著之林。

就印度而言，尽管这一时期产生了迦梨陀娑这样的大诗人，文学艺术繁荣兴旺，但此时的印度文学理论却并没有什么成就，呈现出一种文学兴盛而文论沉寂的现象。自公元2世纪产生《舞论》之后，到公元7世纪婆摩诃《诗庄严论》和檀丁《诗镜》等一系列文论著作问世之前，在这漫长的八百多年数百年间，印度基本上没有重要的文论著作问世。

罗马帝国这时期的文论也落入了低谷。在这数百年间，只有两三个文论家值得一提，即大约与曹丕（187—226）同时的斐罗斯屈拉塔斯（约170—245）、大约与阮籍（210—263）同时

的普罗丁（204—270），以及大约与陶渊明（365—427）同时的圣·奥古斯丁（350—430）。除此以外，几乎再也找不出什么文论家。而且，自圣·奥古斯丁以后直至圣·托马斯·阿奎耶（1225—1274，他大约与元代编《瀛奎律髓》的方回〔1227—1307〕同时），在这漫长的八百多年时间里，西方文论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文论家和文论著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魏晋南北朝文论可谓群星灿烂、名家辈出。以曹丕《典论·论文》发其端，陆机《文赋》振其绪，刘勰《文心雕龙》总其成，文论著述风起云涌，蔚为大观，除以上三部（篇）外，计有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葛洪《抱朴子》外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钟嵘《诗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萧统《文选序》、萧绎《金楼子·立言》、裴子野《雕虫论》、颜之推《颜氏家训》等等多部（篇）文论（或涉及重要文论思想的）著作。在这十几部（篇）论著中，《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尤具文论价值，而其中被誉为“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则成为中国文论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堪称世界古代文论史上最伟大的文论著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理论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也是整个世界古代文论的又一个高峰！

基于这一状况，本书下半期（公元3—6世纪）的文论史论述重点放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文论上，当然，对于普罗丁与圣·奥古斯丁，本书也给予了相当的篇幅加以论述，因为他们对西方中世纪文艺思想产生了决定性意义的影响。

第三编

中国两汉、古罗马与印度孔雀王朝 及贵霜帝国时期文论

